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春秋史笔】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胡 平
【往事追忆】	抄家的经历	晓 剑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春秋史笔】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 胡 平 ·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说毛要发动文革，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大权旁落；然而只有当毛对自己的绝对权力有极度的自信，他才敢于、也才能够发动文革。这两者不是正好相反么？

本文就从解答这个疑问开始。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泽东，一方面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危机感（用张显扬的话就是：“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这是他发动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权势达到空前的高峰——这是他发动文革的本钱。在文革四十年后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毛的这种意图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

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 二、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只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只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等到了1968年2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认真贯彻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只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516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只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

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只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 三、毛在文革前夕的权势地位，从低谷到巅峰

文革前夕，毛泽东是否大权旁落？或许在中共高层，毛的某些讲话已不如过去那么灵光，但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毛的权势却是达到1949年以来的高峰。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现象：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结果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导致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大暴君大昏君毛泽东不因此而垮台就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三五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达到最高点，以至于攒足了发动文革的本钱。这实在太不合情理了。如此惊人的巨大逆转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本来，到了1961年，面对大饥荒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退却，让刘少奇等务实派领导人出面，放弃了一些荒谬的说法和做法，调整了经济政策，使中国走出死亡峡谷。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通过的党章，党代会5年一次。1961年就该召开九大。毛泽东深知，倘若如期召开九大，三面红旗的问题，大饥荒的问题，免不了会提上议程，他的错误势必会遭到某种批评追究，即便不下台，其权力也必然会大幅度削弱或架空。因此，毛泽东耍赖，硬是把党章扔在一旁，就是不开九大。

可是不开会也不是办法，因为党内有压力。于是在1962年1月开了个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主要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一点自我批评，毛泽东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要“发扬民主”，也多少让与会者出了点气。

七千人大会不是公开举行的，会上没有改选，也没有发布公报或决议。整个会议媒体没有一个字的报道，毛泽东的职务没有任何变化。在社会上，一般民众由于不知情，因此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党内，尤其是在党内上层，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获得了巨大的声望，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则降到中共七大以来的最低点。接下来，刘少奇等务实派又举行了西楼会议和广州会议，为1959年庐山会议后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除开彭德怀等为首者）平反，商议为1957年打成的右派分子实行甄别，并准备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实行更宽松的政策，等等。

然而，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七千人大会结束后还不到8个月，在1962年9月份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变被动为主动，一举夺回了话语权，也就是对党的主导权，重新强化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并且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搞经济建设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那么。毛泽东这场翻身仗是怎么打赢的呢？分析分析他在会上的讲话就清楚了。

实际上，还在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为接下来要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定下了调子。在8月9日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一上来就说：“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

可以想见，很多来开会的人一听到毛泽东这句话，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七千人大会不是说好要进一步调整政策，恢复经济吗？不是说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让人批评吗？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共产党垮台不垮台的问题了呢？

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了。是的，共产党犯下了这么大的错误，不改不行；可正因为错误犯的太大了，真要改起来，要改彻底，改得起吗？中国的民众遭受了这么大的灾难，真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他们能饶过共产党吗？

不错，从表面上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似乎还是稳固的。由于长期的洗脑，由于封锁消息掩盖真相，大多数民众对他们身处灾难的严重程度以及共产党错误的严重程度是不清楚的，因此似乎也看不到有多么强烈的不满和要共产党下台的意愿。但老百姓不知道的，中共高层是知道的。正如后来万里所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因此，中共高层不能不有危机意识，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讲话并非危言耸听。

接下来两句话就更让与会者担心了。接下来毛泽东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众所周知，国共两党之间有血海深仇，尤其是49年共产党掌权后，对残余的国民党势力更是不遗余力地残酷镇压。国民党重新上台无疑是共产党的最大梦魇。因为三面红旗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牢骚满腹，怨气很大；在外部，西方人猛烈抨击，苏联人无情嘲笑，在台湾的蒋介石誓言“反攻大陆”，“解民倒悬”。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包括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以来的最大危机。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震慑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党内同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进一步批评三面红旗，谁还敢追究三年大饥荒的责任呢？谁还敢议论毛泽东的是非呢？于是，不是靠别的，而是靠着共同的犯罪感，中共高层达到了新的团结。而罪魁祸首毛泽东则理所当然地又成为这个犯罪团伙的无可质疑的最高领导人。

倘若在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提出“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时，与会者就说：是的，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我们对人民犯了大罪，非鞠躬下台无以谢天下。或者说，共产党下台不下台要让人民来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一党专制，我们必须实行民主。那么，毛泽东接下来的戏就没法再唱下去了。反过来，既然党内没有人敢于说这样的话，所以这个党就只好服从毛的逻辑。就这样，毛泽东走出低谷，赢回主动。一个大恶魔，在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后，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在短暂的退却后东山再起，而且获得了比原来还大的权力。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哈耶克这里讲的还是那些“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中共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政党，所以在其内部，这种“最坏者当政”的趋势就更明显更强大。共产党用强力推行其大跃进的“伟大理想”，其手段之恶劣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越是好人越是进退两难，越是坏人越是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谬误，很快就招致惨重的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重大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在地承认错误，承担罪责，这就很可能导致整个一党专制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如1959年庐山会议那样）；或者是，在维护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对某些实际政策作出有限的调整与改革，这就必须维护和加强党的高度统一，一方面文过饰非，继续以谎言欺世，一方面展示铁腕，震慑与镇压一切敢于揭露其罪恶和挑战其专制权力的人们。显然，这种事只有坏人干起来才最急切最得心应手，所以最容易夺得主动；但凡还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为其难，所以就沦为附庸。于是乎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

不错，共产党内也有好人，但是在共产党内，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坏人做了坏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维护党的统一，要维护党的权力不容挑战，就必须维护政治高压以震慑人民，就必须替坏人背书，就必须默许甚至支持坏人对民众的镇压。这就让坏人拖下水了，这就让坏人主导局面了，这就和坏人同流合污了，从而也就使得自己变得和坏人差不多了。

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八届中全会上赢得主导权，说到底，就因为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党，在内部，党的利益至高无上，党的权力至高无上，乃是不言而喻、不容置疑的第一原则。有了这个第一原则，很多事就没法讲了。倘若在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提出“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时，与会者就说：是的，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非鞠躬下台无以谢天下。或者说，共产党下台不下台要让人民来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一党专制，我们必须实行民主。那么，毛泽东接下来的戏就没法再唱下去了。反过来，既然党内没有人敢于这样说话，所以他们只好顺着毛的逻辑即极权主义的逻辑走下去。

#### 四、目标转移与价值替代

还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是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这后一点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凭借着这个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就对外维护住了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且也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伏笔。接下来，毛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毛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是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个出气筒，又刺激了与迎合了党内和一般民众的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也不难赢得党内的附和。再接下来，毛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以及在城乡展开四清运动。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则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此等等。它们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一直有不少学者专家认为，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很不相同。马克思强调存在，毛泽东强调意识；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马克思强调物质，毛泽东强调思想。不过依我之见，毛泽东并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那么远）。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对马克思的修正是出于现代化建设受挫的反动。只因为大跃进遭到惨败而毛又不甘心认输，毛才另辟新径，别出心裁，独树一帜。

其实，毛泽东领导中共赢得政权之初后，本来也是打定主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似乎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求胜心切，说“我们不能走各国经济发展的老路”，遂发明“大跃进”。当时对钢铁、煤炭、粮食和棉花等主要生产项目都提出了产量加番的具体指标，把年产多少钢多少粮看得比天还重。象“十五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这类口号，今人只知道去批评它的不切实际，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后的价值标准。所谓赶上英国和超英赶美，无非是指在短时期内使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标准。

可是，大跃进遭到惨败。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是令人沮丧，令人绝望的。就在这时，毛泽东转移了目标，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号取而代之。“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挂帅”，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经济讲得少了，革命讲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讲思想的革命化。物质的指标变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是为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服务，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成了先进的同义词。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与意义，那时候人们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资本主义早就是垂死腐朽；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如何追赶西方（那意味着我们不如西方先进），而是我们要怎样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我们才是最先进）。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们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地移到了中国，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还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的错，洋人的错。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林彪更进一步宣布，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不属于他们。

可以想见，毛发动的这一番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也不难赢得党内的广泛支持。毕竟，大饥荒的罪责不仅在毛，也在党，因此党也需要文过饰非。再有，作为统治有五千年历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共产党，它总不能满足在各个领域都马马虎虎平平淡淡，老是二流三流角色（毛在成都会议上讲：“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否则对内对外都不好交待。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制造高潮。它不但要有足以令群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群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从而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共产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经济上不行了就搞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在这一点上，毛和他的党是相通的。他们有着同样的焦虑，因此也有着同样的需要。所以二者一拍即合。

就这样，一种具有原教旨主义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其实它不是什么原教旨主义，因为它远比原教旨更偏狭，更色厉内荏，更富于攻击性，不论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文明都更带敌意，更不宽容。有识之士无疑会对此感到不安和忧虑。党内高层比较清醒、比较务实的人也试图抵制，但为时已晚。毛的个人权威在党内高层中或许打了折扣，但在全党全军全民的范围内却达到顶峰，而最为毛的这套思想疯魔的是青少年，尤其是那些城市里的大中学生。这下，毛就有本钱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 五、为什么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

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还在1965年毛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下面的人就该起来造中央的反。毛发动文革，号召群众造反，深知共产党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上层一变，全党全国就都变了。他希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凭着多年来造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使得“下面”能够制约“上面”。这样，在他死后，就算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了台，控制了党中央，因为怕地方大员和革命群众造反，想搞修正主义也不敢。所以毛要搞文革，要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这就是林彪说的：毛百年之后依然是我们的最高领袖，谁要在毛的身后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 六、文革未必是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最怪异也最费解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此举被认为是史无前例。其实未必。

首先，它和古代某些开国皇帝杀戮功臣之事不无类似之处。例如朱元璋，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分析起来，朱元璋大杀功臣并非只是其天性“雄猜好杀”，那也和他的特殊情况有关。朱元璋出身微贱（在这一点上他和李渊、李世民以及赵匡胤大不相同），又不是义军的创始领袖（在这一点上他又不同于刘邦），因此他感到自己做皇帝的权威先天不足；而和他一道打天下的功臣们又多是桀骜不驯之辈（能不是吗？）。朱元璋杀功臣是为了消除威胁其家天下的隐患，并把官僚集团改造成更顺手的工具。我们知道，毛泽东对朱元璋十分欣赏。早在文革时期，就有人私下议论，把毛泽东的文革和古代的杀功臣作类比。应当承认这二者确有相似性。

其次，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会更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

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 七、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正如法国学者福瑞（Francois Furet）在《一个幻象的消亡》（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里所言，像文革这种“革命中的革命”（a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用林彪的话叫“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像这种“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斯大林在大清洗里就搞过。严格地讲，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和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当年，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如马雅科夫斯基在长诗《列宁》中所以说：

党和列宁  
是一对孪生的弟兄。  
在历史母亲看来，  
谁个更为可贵？  
当我们说到列宁，  
我们指的是党；  
当我们说到党，  
我们指的是列宁。

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使党成为伟大领袖的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

不妨再谈谈斯大林的大清洗。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他的《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引用了盖迪与纳莫夫（J. Arch Getty, Oleg V Naumov）在他们合着的《通向恐怖之路》（The Road to Terror）里的一段话。作者说：“在1933年和1935年，斯大林和政治局联合各级干部的中坚份子筛选或清洗无助的普通党员。然后，地区领袖们利用那些清洗来巩固他们的机器和开除‘不合时宜的’人们。反过来，这产生了1936年的另一次力量组合，在这次组合中，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干部站在了普通党员一边，他们抱怨受到了地区中坚份子的镇压。1937年，斯大林公开动员全体‘党员群众’反对干部；这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份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但是，1938年，政治局改变了力量组合并加强了地区干部的权力，作为其试图在恐怖期间恢复党内秩序的努力的一部分。”



斯拉沃热·齐泽克写道：“当斯大林采取冒险行动时，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直接求助于低层普通党员，鼓励他们说出他们对地方党领导独裁统治的抱怨——由于他们对政权的愤怒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便更加猛烈地向个人化了的替代目标爆发出来。由于上层干部在清洗中同时掌握着行政权力，便导致了自毁式的恶性循环，实际上每个人都受到了威胁（82个地区党委书记中，79个被枪毙了）。”齐泽克指出：斯大林直接对广大党员讲话，采纳他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态度策略是非常冒险的。因为正如盖迪和纳莫夫所说：“这不仅威胁到将上层政治公开交于公众审查，而且还冒着使整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名誉扫地的风险，斯大林本人就是该政权的一个部分……最后，在1937年，斯大林破坏了游戏的所有规则——实际上是彻底毁掉了游戏，发动了一次群众斗群众的恐怖行动。”

按照上面的叙述，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联合各级干部打压普通党员，其次是支持普通党员反对各级干部，最后是重新加强地区干部的权力，恢复党内秩序。这里的第二阶段不是和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有几分相似吗？正是这第二阶段，“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份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这就如同文革中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讲到斯大林的肃反运动（即大清洗）时也联想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独有偶，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共产党掌权后十七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始于1934年，距十月革命的1917年恰恰也是十七年）。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打出“扩大民主”的旗号。按照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权力学》里的描写：“在报刊上掀起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大运动。《真理报》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材料是谈‘揭发和铲除人民的敌人’的。在每个党员，每个‘非党布尔什维克’展开‘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要求对‘人民的敌人’提供揭发性材料。‘即使批评只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这样的批评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了鼓起人数众多的告密者大军的精神，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宣传一再重复斯大林的这一著名要求。从‘揭发人民的敌人’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机关、工厂、矿场、铁路和水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各类学校、艺术界、文化界、科学界都牵涉到了。……党员与党员，党委与党委，州与州，共和国与共和国在揭发人民的敌人方面展开了竞赛。……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质和斯达汉诺夫运动时的规模。告密督促着所有的人，兄弟告发兄弟，儿子告发老子，妻子告发丈夫，所有的人告发一个人，一个人告发所有的人。……如果说在首都事情还是按照特征表发展的，在地方上告密狂则发展成了告密混战。”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搞文革是靠群众，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靠秘密警察。其实不尽然。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是要靠群众的，靠群众——普通党员和非党布尔什维克即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其实稍微想想就会明白，如果不是发动群众大举揭发，如果单单靠斯大林和内务部，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清洗掉那么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呢？大清洗与文革的区别之一在于，在苏联的大清洗中，内务部拥有非常权力，可以逮捕任何地方上的党的官员，群众对他们认定的“人民的敌人”没有直接处置权；而在中国的文革中，群众组织自己常常就可以把他们认定的走资派等拉下马，夺权或关入自设的牛棚以及诸如此类。

大清洗对苏共精英造成空前的灾难。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70%被枪决；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提到的六名领导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除斯大林本人外，全都死于非命；老布尔什维克几乎被消灭干净；与此同时，斯大林提拔了五十多万（！）年轻党员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以填补老革

命被清洗后留下的空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列宁逝世（1924年）后才入的党（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就这样，苏联共产党成了斯大林的党。中国的文革与此类似，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70%被打倒或靠边站，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被肉体消灭。通过文革，毛泽东把四人帮等一大批新人安排进各级领导岗位，使得共产党成为他自己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也正像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者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铄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年监狱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是当时被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象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中国的文革也是如此。现在许多人一提起文革浩劫，以为那只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灾难，有人甚至还以为文革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好处，甚至把毛泽东还看成普通老百姓的大恩人。实际上在文革中遭受苦难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

主张“两个文革”和“人民文革”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有两个文革，是不是也有两个大清洗呢？一个官方的大清洗，一个人民的大清洗。在苏联的大清洗中，难道没有人趁机揭发和铲除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敌人吗？在被打倒被处决的苏共官员中，难道就都是好人？难道就没有很多坏蛋，就没有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分子吗？再说，狡诈的暴君总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当暴君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决策引起广泛的民怨，他就会把一些忠实执行自己决策的下属推出去作替罪羊，例如先后主持大清洗的内务部长雅戈达和叶若夫就都是斯大林亲自下令撤职并处死的。我们能不能由此便得出大清洗具有某种人民性的结论呢？

#### 八、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讲话）。不对。若说“一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揭发阴暗面的方式”，那本是现成的，早已有之，何须再去寻找？这就是新闻自由。毛对新闻自由的威力清楚得很。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到：“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由此可见，毛所要寻找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阴暗面的方式”，是那种在他一手控制之下，遵循他的意志，依据他的思想，专门揭发别人的阴暗面，专门揭发他的政敌们的阴暗面的方式。这就是文革。

应该说早在1957年毛就做过这种尝试了。当时，毛号召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给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始于此），“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殊不料引出一大堆右派言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党天下，要求修正主义要求自由化，于是毛展开反击，整风就变成了反右。我们完全可以说反右是早产的文革，是流产的文革。等到九年之后，党的思想改造大见成效，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这一代青年学生被洗脑的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当刘少奇们把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打成右派时，他们显然大错而特错，因为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分明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是比左派还左的极左派。他们的立场难道不是和五七年的林希翎、谭天荣们截然相反吗？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直言不讳地宣布：“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这段话在“炮轰”、“火烧”中被无数次引用）。直到今天，仍有人宣称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动广大群众向他自己缔造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器造反是“伟大的创举”。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大创举啊？毛分明是嫌他的党、他的国家机器对他还不够十分的顺从，毛分明是要把党和国家进一步变成自己的百分之百的奴仆和工具。这是古今中外一切独裁者内心向往但多半不敢公开说出口的最大梦想。这是邪恶的伟大，无耻的伟大。这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狂妄、更邪恶、更无耻的吗？

另外，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反对官僚主义也是极大的曲解。毛在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倒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当作主要对象的。文革的目标明明是反修防修，其对象明明是走资派和资本主义路线。毛只是在个别讲话时提到官僚主义而已，从未将之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

## 九、毛泽东打平反牌赢得人心

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写道他在监狱中和一个保守派思想家、长沙一中同学程德明之间的讨论。程德明认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整肃批评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杨小凯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但他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杨小凯说：“毛泽东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程德明说：“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杨小凯说：“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

杨小凯这段话表明，在文革中，毛泽东打出平反牌是他赢得人心的关键。毛泽东发动文革，号召群众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确立并强化他的极左路线，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当时的群众虽然对毛十分崇拜，但是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对于某些被指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或多或少还是有一定好感的，因此他们参加运动就不免怀有很多疑虑，缺少主动性和自发性。在运动初期，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依照以往搞政治运动的惯例，把自己视为党的化身，把那些敢于向自己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并对群众分类排队，依靠党团员、红五类，歧视、排斥和打击那些出身不好的和有历史问题的或犯过错误的，使很多群众感到非常压抑。工作组撤离后，接下来的文革会和红卫兵（此处的红卫兵是指最早成立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也叫老红卫兵或老兵）在压制群众方面更是变本加厉，打老师打同学，他们还杀出校园，把暴力行为推向了全社会，制造了极其恐怖的红八月。顺便插一句，我们知道，上述一系列做法后来被称之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这岂只是刘邓路线。这是党路线，是毛路线。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其始作俑者正是毛本人。后来，毛诡称派工作组没有经过他同意，把工作组做的事完全推到刘邓头上，这且不论。那么红卫兵呢？红卫兵、红八月也可以完全推到刘邓头上么？红卫兵难道不是毛亲自出面支持的吗？红卫兵在红八月的血腥暴行难道不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其宣传机器的怂恿和鼓励下干的，而且是在刘少奇已经靠边、工作组已经撤销、“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毛泽东8月5日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语）已经结束之后发生的吗？这怎么能统统都推到刘少奇头上去呢？

就在这时，毛却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打出平反牌。1966年13期《红旗》杂志社论吹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不但工作组被否定，老红卫兵也受到批判。不但是那些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人得到平反，那些因为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或其他问题而被批斗被关押的群众也纷纷得到解放。这在“新中国”十七年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过去搞运动总是群众挨整，如今群众这个头衔倒成了免于挨整的护身符。过去搞运动整群众，整错了也绝不会认错，材料永久性地保留在档案里跟你一辈子，如今被整的群众堂而皇之地得到平反，黑材料不交出来就抢出来当众付之一炬。过去搞运动，总有些党团员积极分子一马当先，热衷于在群众中挖出阶级敌人，紧跟领导，永远正确，如今他们却被批评为站错了队，充当了反动路线的打手，搞得灰溜溜的。前阶段运动打击面太宽，广大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连怒都不敢，如今群众则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人们纷纷成立和加入各种造反组织，写文章开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誓要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只有在这时，广大群众参加文革才显示出真正的自发性。

应该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具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份，因此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这和真正的保护人权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仅仅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他们还积极地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众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资派中，首当其冲的是彭德怀、邓拓式的干部；在被宣布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狠加批判的各种政策和观点中，主要是那些比较务实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东西。造反派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政治迫害的，是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保护自己打击对方的，结果就成了为毛的例如三面红旗一类罪恶背书，倒去批判那些在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上比较务实的和稍具自由化的东西。毛泽东打出平反牌为自己赢得了人心，赢得了群众，有力地打击了政敌，从而也就维护和强化了他那套极左的路线。

#### 十、造反派受了个大蒙蔽

记得在1969年夏天，我们几个朋友议论文革，一位老造反朋友就说：过去我们总说老保们受蒙蔽，其实我们也是受蒙蔽，受了个大蒙蔽。

在《毛主席的孩子们》这本书里，陈佩华（Anita Chen）写道：造反派“表示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他们忽略了所许诺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他们从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意味着埋头读书的学生被批判为‘白专’，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不是学习水平而是阶级成份。随后几年中，他们看到的是教育质量飞速下降，高校招生要通过家庭关系去‘走后门’。新的教育制度与从前他们希望的大相径庭。他们原想毛主席会支持打破旧的条框束缚，象在文革中的大民主一样。但事实上，文化界从来没有像1970年这样的荒寂，并且受到了严密的控制。他们曾经帮助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物质刺激，但到农村和农民接触之后，发现农民更喜欢刘的路线。”

无须乎进行全面周密的调查统计就可以发现，造反派和保守派在成员构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保守派中，党团员多，红五类出身的多，被官方视为积极分子的人多；在造反派中，相对而言，非党团员多，出身中间家庭和黑五类的人多，被官方视为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人多，过去犯过所谓政治错误的人多（注意：这只是相对而言。在造反派中，党团员、红五类也为数不少，且常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大部分黑五类是逍遥派）。造反派容纳了比较多的在文革前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以为这些人加入造反派是出于对体制的不满；并进而推论道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具有反对现行体制的意义。按照这种解释，保守派既然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 they 要当保守派。

没有比这种解释更似是而非的了。和学生切身利益最相关的莫过于教育体制。试问：对学生而言，尤其是对我辈尊师重道，学习成绩好而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大好的学生而言，究竟是所谓旧的教育体制、所谓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更符合我们的利益，还是所谓新的教育体制、所谓毛的教育路线更符合我们的利益，那还用说吗？事实上，在运动初期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我们这类学生本来还都是被动的，偏于保守的，内心深处是很困惑很苦恼的。可是同样是我们，等到后来成了造反派，等到后来我们自己提出各种版本的教育革命方案时，却是一个比一个左，都是主张政治挂帅，坚持五七道路，把阶级斗争当作一门主课，轻视课堂教学，轻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强调与工农相结合，强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革命大批判，和一切封资修彻底决裂，废除高考，把上山下乡视为必经之路，以及诸如此类。北京的很多中学生（主要是造反派），甚至还没等到毛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就主动地、自愿地，甚至争先恐后地上山下乡。我们在拼命做着和自己利益相反的事情——没过几年就叫苦连天，后悔莫及了。

为什么我们在运动初期对所谓教育革命还心存疑虑，而到了后来揭竿造反时却又变成了教育革命的急先锋了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前阶段受到压制，而毛泽东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我们平了反，把我们从前阶段的政治歧视与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大喜过望，感激涕零，由是而倍生报效之心，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毛路线一边。用当时的话就是“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作为过去受歧视受排斥的一批，我们更急于显示自己对毛路线的理解与忠诚，尤其是想证明自己比那些先前被视为积极份子的人们更革命。这样一来，我们就把自己本来有的种种困惑与怀疑统统丢到一边，把自己本来有的某种朦胧的自由化倾向——如果它们不符合现今的毛路线的话——统统丢到一边。我们越是希图通过革命造反获得自我的肯定，结果便越是造成自我的迷失。

学生的情况是这样，工人和职员及市民的情况也差不多。顺便一提，毛泽东本来是搞农民运动起家，中共的武装革命也主要靠的是农民，但是在文革中，毛却把农民撇在一边。文革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群众领袖，但竟然没有一个著名的群众领袖是农民。道理很简单，三年大饥荒，农民受害最深，都知道三自一包要比三面红旗好，要让农民也起来自发地反对刘少奇恐怕没那么容易。因此，毛对农民不放心，在农民中宁肯继续扶植文革前的劳动模范（如陈永贵），也不肯制造农民中的蒯大富或王洪文。

按照杨小凯的分析，毛之所以能在文革中战而胜之，是因为毛巧妙地利用了“在朝右派”和“在野右派”之间的“历史误会”。在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等方面，和毛的极左相比，刘邓路线是偏右的，是比较有利于人民的（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按理说，群众，特别是我们这些具有朦胧自由化倾向的“在野右派”，是应该支持刘邓反对毛的——至少是不应该反过来支持毛而反对刘邓的。但是由于我们受到据说是刘邓路线的压制（如前所说，那并非只是刘邓路线，那是党路线，是毛路线，不过在当时我们见不及此），是毛把我们解放了出来，因此我们就一头扎进了毛的阵营，激烈地反对刘邓，不但反对刘邓对我们的压制，也连带着反对刘邓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比较理性务实的政策，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权力，同时也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那套极左路线。等到毛战胜了政敌，回过头来收拾造反派，我们这才发现，我们面对的政治压迫丝毫不比刘邓路线逊色，而我们面对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政策却要比刘邓的还要恶劣得多。糟糕的是，这后一方面竟然是我们自己参与促成的。这不是“受了个大蒙蔽”又是什么呢？

## 十一、孤家寡人的绝对权力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毛泽东在利用造反派打倒政敌，巩固和强化了他那套极左路线之后，接连发起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打垮了造反派。造

反派既然把毛奉为最高权威，故而在来自毛主席司令部的打击下毫无招架之功。在文革中，造反派并不是唯一的牺牲品。老红卫兵、保守派也是毛的牺牲品。还有党内的不同派别，也都是相继被毛利用而又先后被毛打击。最后只是造就了毛一个人的绝对权力。

1969年3月，中共召开九大，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来很奇怪，在这时，毛泽东的社会基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薄弱。三年文革，毛泽东几乎把全中国各个阶层和党内大部分派别都挨着个得罪个遍，但偏偏就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毛的权势达到顶峰。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都讲过，君主最好是让臣民既惧怕又爱戴。如果两者不可兼得，那么宁肯让人惧怕。因为爱是主动的，操之于人，别人想不爱就可以不爱；怕是被动的，操之于我，你想不怕也不行，怕就是不得不怕。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仅仅是出于惧怕而不得不服从你，几乎没有什么人是出于爱戴而真心拥护你，你的江山还能坐得稳么？

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被某个独裁者或一小撮寡头所控制呢？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独裁者和寡头们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压迫全社会。他们起码要有一支效忠自己的军队（御林军或曰禁卫军），而这支御林军自身的忠诚不可能是出于强迫。既然他们就是强迫力量自身，谁还能强迫他们呢？他们自己当然不会强迫自己，所以，他们的忠诚只能是出于自愿。董卓人人都怕，是因为他拥有吕布；吕布当然不怕吕布，所以吕布效忠董卓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自愿。

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考虑到斯大林晚期的情况提出下述分析。他说：“通常假定，没有自愿的支持，例如信得过的禁卫军支持，权力就无法行使。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看来有些独裁者谁都害怕，例如斯大林统治的末期，谁都怕他。事实上容易理解，单独一个人不需要相当可观的自愿支持，就可以很容易对许多人实施统治。如果在一个群体中，每人都认为所有其他人会服从一个声称是他们共同上级的人的命令，所有人就会服从这个作为他们上级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担心，如果不服从，其他人就会按照上级的命令处罚他，所以所有人仅仅猜想其他人继续服从而被迫服从，不需要群体中的任何成员给上级以任何自愿支持。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甚至会感到不得不汇报同志中的任何不满意迹象，因为他担心，在他面前任何诉苦，都可能是密探对他的考验；如果不汇报这种颠覆性言论，就会受到惩罚。因此，群体中的成员之间如此互不信任，以至于即使在私底下也只能表达对上级的忠诚，虽然大家暗地里都痛恨他。这种赤裸裸的权力的稳定性随着所控群体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因为在少数个人伙伴之间由于互相信任碰巧结合而可能在当地形成的不满核心，会被周围大量被认为仍然忠于独裁者的群众所吓倒而瘫痪。因此对一个大国的控制，比对在海洋中一只船上的水手的控制还容易。”（我当初在《论言论自由》一文的“当代专制主义的奥秘”一节中里也提出过类似的分析，和波兰尼不谋而和）。

大约是在1979年吧，《世界文学》发表了一位匈牙利作家写的讽刺小说。总书记死了，书记处的书记们都出席葬礼。默哀开始，大家都把头深深地低下，三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每个人都竭力作出悲痛欲绝状，好像陷入无边的哀思以至于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想抬起头来，但谁都不敢先抬头，谁都怕自己先抬头而被别人视为对领袖爱得不深遭到清洗，同时每个人又都虎视眈眈，等着看有谁敢于先抬头，然后一拥而上把他打倒。就这样，他们低着头，直到有一天来了辆大卡车把他们统统装上去送进历史博物馆。直到今天，如果你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的话，还可以看到他们定定地站在那里，深深地低着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在大独裁者死了以后，他仍然有可能利用上述群体心理，保持住自己

的巨大威慑力，使得他的继任者们不敢反抗，哪怕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对他早就心怀不满了。毛的如意算盘大抵就是这样。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1976年四五运动的伟大意义了。当千千万万的民众各自暗中怀着对毛、对文革的不满，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时，他们猛然发现：原来有那么多别的人也和自己想的一样！于是，毛的受万众拥戴的神话破灭了。毛自己当然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对他的亲信们说：“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想，如果毛不是在四五运动被镇压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撒手人间，而是像邓小平那样，在六四后又活了七、八年，因而有足够的时间稳住阵脚，调整应对，情况又会如何呢？

## 十二、毛的身后

众所周知，毛泽东生前对接班人问题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机，为此不惜在党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清洗；然而毛一去世，尸骨未寒，自己的老婆和一班亲信就被打成“反革命”锒铛入狱，那显然不合乎毛本人的意愿。因而人们有理由怀疑毛泽东本来留有一份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遗嘱，对“四人帮”一派有利，但是被华国锋等先下手为强，“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份遗嘱也就被封锁或销毁了。

上述推测固然有它的道理，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就接班人问题留下遗嘱或密诏。毕竟，毛泽东不是皇帝，他不能通过一纸遗书或密诏确定接班人选。共产党也没有靠领袖遗嘱或密诏确立接班人的先例或传统。例如著名的列宁遗嘱，其中虽然对几位“亲密战友”逐一评判，但并没有明确表示要谁接班的意思。

一般来说，如果独裁者决定用遗嘱的方式确立接班人，那么，他需要让朝野上下一一起码是文武重臣——都知道有这样一份遗嘱的存在，并且对之严加保管；否则，“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从中破坏，在“伟大领袖”死后作乱，或者把遗嘱涂改伪造，或者干脆扣下不发（对外就说没有），那岂不前功尽弃，坏了大事？

我不相信毛留有指定接班人的遗嘱，更重要的理由是，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并不能单独确立自己的继位人选；因为在理论上，领袖的权力不是属于领袖自己（这点和古代的皇帝有别），而是属于党。在程序上，毛泽东只能提出某一职位的人选，然后还须经过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通过。这意味着，毛泽东如果想把某人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他只能在生前就完成相应的安排。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这样确立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这样确立的。华国锋是由毛亲自提名，再经由政治局通过而出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注意：当时特别强调是“第一”副主席，以拉开和其他副主席的距离）和国务院总理，成为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并保持这种地位直到毛去世，这等于是宣布了华的接班人身份。因此，要说毛的本意只是把华当作一个过渡性人物，另留下遗嘱让“四人帮”掌握大权，并且一直到临终都秘而不宣，这种分析是站不住脚的。

毛在晚年对接班人问题机关算尽，但最终还是失算了；不过也不尽然。如果毛向左派（“四人帮”）一边倒，右派要抗争，只能公开打出“非毛”“反毛”的旗帜，若右派获胜，哪里还会有今天的毛泽东纪念堂？毛让华接班，指望华能平衡左右两派，没想到华与右派联手，利用其正统地位而轻易地打倒了左派。这就应了毛在林彪事件后公布的那封先前写给江青信里的一种预言，右派果然在毛死后闹事，但还是打出毛的旗号。毛的名字竟被利用

来作反毛的事，但毛的名字却也因此而得到保护。就这点而言，毛并没有全盘失算；你甚至可以说，以毛犯下的滔天大罪，包括对他的党所犯下的滔天大罪，毛身后的名誉居然还能得到该党的精心保护，他的算计已然是很精明的了。

十三、还会再来一次文革吗？

在文革这场大灾难过去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听到有不少人高呼“再来一次文革”。初听之下，很是让人惊讶。

不过认真读一读这些人的文章讲话，我们发现，原来他们所呼吁的文革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文革。他们所说的文革是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是群众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发动和支持下批斗当权派，批斗贪污腐败的大小官员。有的人还愤愤地说，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一定要把那些当权派整得更厉害点。

且不说把文革中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成是整治贪官污吏，大有扭曲文革本来面目之嫌。问题是，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批判反动路线和揪斗各级当权派也只是其中的一段而非全版。看来，在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那里，文革就像一条香肠，想从哪儿切就可以从哪儿切，想吃哪段就可以吃哪段。文革是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他们不要前面三集，也不要后面四集，只要中间三集。他们不要批三家村，不要对文化界黑帮黑线的全面专政，不要红八月，也不要清理阶级队伍，不要清查五一六，不要一打三反，不要上山下乡；只要中间一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要揪斗当权派造反夺权。多惬意啊。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们，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后悔药者一样，在他们关于再来一次文革的想像中，别人，尤其是他们的敌人和对手们，统统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剧本原封不动、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战友们却可以凭着事后的聪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选择。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你有了后见之明，别人不也一样吗？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你计划在文革第三集第四集把你的对手整死，没准儿你的对手却早就琢磨着赶在第一集第二集就先把你整死呢。

可见，关于再来一次文革，关于再来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说法，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它们只是表达一种情绪而已。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革是空城计，只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能搞成那个样子，就在于当时人们都不知道（或自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知道）毛到底要做什么以及毛到底要怎么做。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当时的人，不论是出于年幼无知还是出于老奸巨猾，都是要跟毛走的，至少是不会正面反对毛的。这个前提不成立，一切就无从谈起。如果刘少奇、陶铸、贺龙以及林彪等一大批老干部们事先就知道他们将被折磨得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他们还会在文革开始时举手支持毛么？如果老红卫兵们事先知道他们的父母也是运动的对象，他们自己也会从小太阳变成反动分子，他们还会去创建红卫兵，为毛泽东打先锋吗？如果造反派事先知道他们的造反只不过是毛利用打击其政敌，一用完就抛弃就进监狱，而后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个更糟糕的社会，他们还会愿意充当这样的工具和牺牲品吗？

我们可以断言，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作出和第一次文革截然不同的选择，所以第二次文革必定会很不相同于第一次文革。更何况今日中国并没有当年那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所以根本就不会再发生一次文革。我不是在“历史不会重复”或“人不能两次



踏入同一条河流”这种泛泛的意义上说不会再发生文革，我是在更强得多的意义上说不会再发生文革。

至于有些人说“文革仍然在继续”，“文革在中国还没有结束”，他们所说的“文革”只是一种引申，一种比喻。它实际上指的是一党专政、政治迫害或钳制言论以及诸如此类。其实，那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人无非是痛感今日中国贪污腐败泛滥成灾，希望民众奋起抗争。对此我们深表赞同。不过我们不赞成“再来一次文革”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太不清晰太不准确，它太容易引起误解，太容易唤起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的痛苦记忆，因此招致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既然有的是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为什么不用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呢？

2006年9月，2016年2月修订

□ 原载《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胡平著）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2016年6月出版。

~~~~~

## 【往事追忆】

### 抄家的经历

· 晓 剑 ·

1966年8月8日，天气炎热，我和同班的五个男生和四个女生共十人，身穿老式黄布军装，腰扎两寸宽的武装带，佩戴“红卫兵”袖章，乘坐公共汽车从海淀区的人民大学附中来到位于东城区的西总布胡同，实施一次抄家的活动。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刚满十四周岁，小的还只有十三岁，在今天尚属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范畴。但我们绝没有需要被谁保护的任何概念，反而洋溢着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保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红色江山的冲动。

所谓抄家，和今天对贪官污吏家产的查封、对刑事犯罪分子窝点的搜查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今天需要搜查证，有时还需要有公安和武警的武装协助，而在1966年则无需任何手续，只要被我们这些“红卫兵”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破门而入，武装协助的是我们自己的拳头和皮带。

抄家行动是当时“破四旧”的组成部分。所谓“四旧”，乃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是也，由于并没有人对“四旧”定出严格的标准，因而对“四旧”的评判完全由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来定夺，譬如不准女性烫头发、男人留背头，譬如制止女性穿裙子、男人穿瘦腿裤，譬如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道、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譬如敲下颐和园佛香阁上的小佛头、砸碎前门大街上全聚德的金字招牌，都是“破四旧”的内容，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关于红卫兵的诞生及其背景，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章记述和研讨，尽管离客观、真实还有一段距离，但因不是本文的主题，因而不加详述，反正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红卫兵在社会上的活动已经合法化，当然，这完全是伟人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所起的作用，在这封信中他老人家表示对红卫兵坚决支持并告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这些因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而备受迫害的“革命小将”一

旦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同，立刻有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感觉，高呼着“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带着每一代人必有的青春冲动、破坏欲望以及对旧秩序的本能反抗，来到了社会上。

其实红卫兵最早干涉社会不是一些文章中指责的抄家，而是打击小流氓，这本应该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好事，但其出发点跟今天的“严打”可能是两回事，因而这些打击小流氓的红卫兵们在1967年以后也有不少成为了在公共场所“拍婆子”、“碴架”、在光天化日下聚众闹事的小流氓，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此略有反映，作家王朔在里面还出演了一个“拍婆子”、“碴架”的小头目，尽管由于太痞而不那么像。

我所在的人大附中曾经以一举抓获在海淀区声名显赫的流氓集团头目“四龙一凤”中的“凤”而名噪一时。现在细想起来，这个“凤”不过十七八岁，略有姿色，大概就是和“龙”们睡睡觉，绝没有吸毒、抢劫、拐卖妇女、欺行霸市、开发廊当鸡头之类的勾当，但被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抓到后，一阵拳打脚踢，不知命中了哪个要害部位，便呜呼哀哉，尸体被扔在教学楼的楼梯下。当天夜里，还有一个父亲是挺有名的将军的高三男学生因着对异性的好奇，前去“研究”了一下她的身体构造，结果被当场擒住，若非他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女，肯定也会被当成小流氓给处理了。

据说这个“凤”是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被打死的第一人，从此，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手下的冤鬼被拉到八宝山去火化，至于有多少人在震惊世界的“红八月”中被打死，尚没有人进行统计，恐怕这也是个不太容易干的事，据当时八宝山火葬场的工人披露，最多时，一天有两卡车尸体拉进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的原始动机大概有两个，一是要收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国民党特务等家庭里藏有的“变天账”、武器、反动文件，二是要剥夺这些人家里以往从劳动人民手里剥削走的不义之财。这时候，被誉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是革过去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说法我们还没有听到，所以除了对老师、校长发威之外，我们这些红卫兵文化的批判和武力的批判的主要矛头还是对准传统上的阶级敌人，也就是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

学校坐落在海淀区，我们却要跑到东城区去抄家，是有着我们的想法的。老北京城有着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说法，就是说东城区住的资本家多，西城区住的贵族多，南城住的是天桥耍把式的，北城住的大都是各种工匠。贱和贫的地方自然不需要抄家，而西城的王府、驸马府在1949年以后不少都改换了身份，成了部长府、司令府，在1966年的8月这里还不是冲击对象，甚至这些深宅大院里的少爷小姐们很多还是红卫兵的头目，后来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还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专门对付那些不知好歹、要去革“新贵”们的命的平民红卫兵。所以，到东城区去抄资本家的家当然成为了我们这些所谓干部子弟红卫兵的首选。另外，我们有个数学老师的家就在东城，她在我们看来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刚刚大学毕业就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无非是因为她的爹是个资本家，在公私合营时国家以二十万元作价，收买了他的企业，于是她家就有了每个月五百元左右的定息吃。而在六十年代，毛泽东的月薪不过四百六十元，五元钱就可以雇一个保姆，一个小学生全年的学杂费是十元钱，家庭月平均收入超过八元就不再享受国家的补贴了，五百元足以让一个家庭不知怎样才能把钱花出去。看着这个数学老师的富裕和奢侈我们就有气，因而想先把她家给抄了。

不过，有比我们行动迅速的红卫兵先下手为强了，我们又不想白跑一趟，找那个胡同的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一打听，说有一家比那个数学老师家还阔气的资本家就住在这个胡同里，而且老头子当过国民党的大官。我们一听，立刻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二话没说，就冲向那个人家。

这是一座两进的大四合院，有着高台阶、大红门、小石狮、厚影壁，正房加厢房加头进院的南房，起码有二十多间。说实话，在我十四岁的生涯中，这是第一次进入到由一家人住的这么大的宅子，心中不由得愤愤不平地骂道：“真他妈是资产阶级！”几年后当我又进到一个部长级的干部家的宅子，看着那三进院和四十多间雕梁画栋、青砖灰瓦的房子时，由于已经阅读过了当时和《血统论》齐名的文章《论财产再分配》和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也就没那么多愤慨和不平了。

也许是预感，或者是听到了传言，甚至是认命，我们冲进这家大宅门之后，并没有看到不满的脸色，更没有听到委屈的声音，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和一个保养得很好的老太太像迎接当年的解放军进北京城一样把我们这些满脸稚气而又凶神恶煞的红卫兵迎接了进去，而且在花坛边的石桌上摆上了热乎乎的茶水。我们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资产阶级放出了糖衣炮弹。

不过，想击中我们这些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红卫兵小将决非容易的事，我们当即朗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然后，迅速解下了腰间的皮带，二话不说，照着那老头子就抡了过去。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肤色很白的老头子一下子就摔倒在地，而且呜呜地哭了起来，而那个老太太则扑通跪了下去，连连磕头。这时有一个女孩子兴冲冲地跑了出来，手里举着一张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委任状，上面的官职是天津法院院长。我们顿时欣喜若狂，纷纷议论着：“法院院长是个大官，肯定有枪！”“说不定还有潜伏特务的名单。”“咱们要立大功了。”“抄这家算是抄对了！”

于是，我们开始了对老两口的刑讯逼供。刑是皮带、拳头、巴掌、木棍及脚伺候，讯是横眉立目、义正辞严及歇斯底里、破口大骂，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反动官僚交代出埋藏起来的武器弹药和反革命材料。不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每个人都必须动口还要动手，否则就是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就是革命立场不坚定，就是妄称革命后代，就是红卫兵的败类！

那老两口苦苦哀求，指天发誓绝没有什么武器隐藏起来，更没有什么反革命材料，老头子还给我们上起课来，说是当时法官从来不佩带武器，他们最严厉的武器就是法律条款，他们的护身符就是黑袍子。当然，他的这种解释只能获得一阵更为狂暴的痛打，直至两眼一翻，昏了过去。

我们认定这老两口是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便把他们扔在太阳下面，让八月的烈日烤晒他们的肉体 and 灵魂，我们则从居民委员会借来铁镐和铁锹，在屋屋外砸墙刨地，寻找我们认为必定存在的那些东西——枪支弹药、变天账、潜伏特务名单。这一类东西被搜寻出来的消息在当时的北京几乎每天都会传来，给我们这些红卫兵带来的冲动和现在什么地方出土了珍贵文物所产生的轰动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番如同下乡拔麦子的重体力劳动过后，除了一堆碎石烂瓦和泥土外，真正的收获就是一沓沓的人民币现金和一串串金银首饰。这家人看来不是土财主，不会把值钱的东西装到腌咸菜的坛子里埋后院或厕所粪坑底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把金银财宝藏什么地方的都有，我们组织的一个红卫兵就从床棱子里抠出几十根金条来，至于后来拍卖抄家得来的一些家具和衣服被褥时，更有人从椅子背里发现金元宝，在棉被里发现几万美元，在枕头里发现翡翠西瓜，在西装夹缝中发现五万元的存折。还有一些人不愿意在被抄家时发现藏有金银财宝，干脆把这些东西扔出家门，像我的既在解放前开过公司又在解放后当上了副局长的大伯父就把上百两金子趁着夜深人静时给拽到北海里去了。有专家分析说，若是把北海的淤泥清理一下，从里面筛出来的金银财宝不仅够支付清理费用，多出来的还够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的。

不过，在当时，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绝对是视金钱如粪土的，如今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描述当年红卫兵抄家时往自己兜里塞东西的情节完全是赋予了今天人们的行为方式。有一件事可以为我的说法作证，那就是1966年秋天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首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上，我作为解说员亲眼看到了被严格管制的展品是各种手枪和战刀，被精心保管的是各种地契和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而金元宝、银元、金条、美元、英镑、宝石、钻石戒指、全绿的翡翠雕件却被随便摆在一边，任人丢来扔去，实际上也没有人对其感兴趣，更没有听到丢失的传闻。

因而，仅仅抄到金银财宝而没有抄到武器和变天账让我们没有感到过分的欣喜，反而有些沮丧，于是对那已经快被晒昏过去的老两口又是一顿暴打，以发泄没有抄家战果的难堪，当然，老两口真的就昏过去了。这时，我们的肚子饿了，生理上的需求并不考虑革命的需要，“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的俗话不因震惊世界的“红八月”而改变其本来意义。可吃的东西在这个大宅子中并不少，先不说厨房里有鸡鸭鱼肉，就是从几间卧室中打开的点心盒子里的各种点心就已经让我大开眼界了，那全是稻香村的产品，我不到十四岁的生涯中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式样的点心。然而，没有一个人去吃，甚至每一个人都会以产生吃资本家家中的东西的欲望为耻辱！我们每人拿出两角钱，交到一个女生手中，让她到附近的北京站去买回一大书包五分钱一个的烧饼，然后让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送来一壶开水，守着那些色香味俱全的高级点心和龙井茶，狼吞虎咽着烧饼，喝着白开水，算是解决了肚子问题。而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没有一个人学习过毛主席老人家关于解放军路过果园而不吃老百姓的果子的最高指示。

到天黑之时，尽管暴打和挖掘继续轮番进行了几次，可我们预想的战果还是没有出现，于是我们决定夜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盛夏的夜依然不凉爽，天上没有云，空中没有风，远处时而传来惨烈的嘶嚎，这一定是阶级敌人发出的，不值得同情。几盏电灯被拉到院子里，我们将老两口置于明亮的灯光下，任凭他们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却绝不被打动，而且还要痛打落水狗。

到了深夜时分，老两口再次昏晕过去，我们的困意也终于来临，于是一个个或坐在屋檐下或倒在土堆上，酣然大睡，我们绝不会想到那老两口若是从昏迷中醒来，完全可以把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一个个掐死。当将近黎明时不远处人们的喊叫声和消防车的鸣叫声把我们惊醒时，我们委实感到了后怕，因为就在这同一条胡同里，离我们抄的这家只有几十米远的另一个被抄的地主家，那个老地主不堪凌辱，放了一把火，将自己和自己的两个老婆一同烧死。幸亏抄他们家的红卫兵们见没什么收获，提前撤走，否则将会酿成更大惨剧。这场火灾，是北京“红八月”中最为严重的事件，从这一夜以后，置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于死地的事情才开始大规模爆发，被皮带抽死、铁棍敲死、绳子勒死、拳头打死、皮鞋踹死、太阳晒死、刺

刀扎死的男女络绎不绝。而我们从火场回来，再也不敢睡觉，用绳子把老两口牢牢地捆住，把所有的菜刀和火柴都收藏起来，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们，生怕他们也会作垂死挣扎。

天亮之后，看确实抄不出武器之类的东西，再加上对夜里发生的事件的后怕，我们决定像当年湖南农民运动搬走地主的浮财那样把这个大院子里值钱的东西搬走，不能让这些解放前过好日子的人在解放十七年后还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简单说，就是彻底剥夺他们靠剥削和权力得来的财产！我们出了胡同，一抬手就拦截住三辆大卡车，见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孩子，没有一个司机敢不停车的，他们对红卫兵的恐惧肯定超过了对交通警察的敬畏。我们告诉司机，去拉反动资本家家中的东西。那些司机一个个连连称是，马上把车开到了大院子门口，真正的抄家开始了。

这家人的西厢房里堆满了大号樟木箱子，查找武器和变天账时，我们已经把它们翻了个底朝天，里面全是四季衣服，而且料子都是绫罗绸缎和各种皮毛，其华贵程度起码我是前所未见。据老太太交代，这是她的嫁妆，共有七十箱，但从解放后，她就再也没穿过，那些充满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味道的式样也确实让她无法穿出门去，她很希望把这些东西破了“四旧”。这意思不用她表示，我们肯定要将其抬走，装上卡车。接着搬走的还有这家人从王府井百货大楼购买的整打的袜子、整捆的床单、成排的呢子大衣、几十款瑞士手表、法国席梦思软床、红木家具，还有什么，我如今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整整搬了一天时间，那三辆大卡车跑了三趟。东西都被送到西交民巷附近的一个大教堂里，那里是抄家物品的收集处。对于这些抄家物品，既不需要给被抄家人打收条，也不会向收集处的管理人员要收条，反正只要这些东西不再属于资本家就行，从理论上说，这无非是一次财产再分配的过程，是对解放后那次财产再分配不够完全的补充。当然，以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只把它看成是剥夺剥夺者的行动，是破“四旧”的一个组成部分。

天黑之前，我们的抄家行动结束了，老两口虽然伤痕累累，但依然活着，不是每一个红卫兵都有动不动就打死人的勇气。九天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小将，用亲自佩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方式再一次肯定了我们的行为。又过了三天，我随着一伙高中学生南下串联，到西安、重庆、贵阳、湛江、广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去了。不久，当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我母亲被打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时候，我们家也被抄了，面对着别人抄我的家，我无话可说。

□ 原载《收获》2006年第2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